

目 录

· 革命风云 ·

- 辛亥革命在洛阳 郭文轩(1)
反袁斗争两英烈 刘梦成(4)
冯玉祥及其“施政碑” 李健永(10)

- 第十八集团军驻洛办事处记事 李健永(11)
忆上海救亡演剧二队来洛宣传 李振山(24)
我与河南青年救亡协会 李振山(33)

· 洛中杂记 ·

- 《中原日报》史略 杨载东(38)
日伪时期的《洛阳新报》 刘梦成(41)
《新洛阳报》的创建 董高生(44)

- 合盛栈创业史 张纪伦(47)

- 震惊古都的复旦中学谋杀案 武宪周等供稿 郭福林 整理 (53)

- 洛阳难民收容所 耿 彤(59)
抗战时期的洛阳关 董文钧(62)
五十年后话“当年” 吴克良(65)
洛阳模范中心学校在龙泉沟 耿 彤(67)

· 名人轶事 ·

民国初期洛阳的特大冤案 砚 耕(70)

——记李肯堂先生之死

“一二九”学运时的侯德会烈士 王文通(75)

百折不挠 革命到底 李文修(77)

——宁晋山三次坐牢始末

忆伯父石维屏 石建厚(83)

郭铁林先生轶事 耿 彤(88)

李振九先生传 李艾嫻 (90)
李达山

我所知道的白光仁 杨戟东(93)

林则徐过洛阳 李健永(96)

· 风雷诗抄 ·

风雷吟 李冷文笺注(97)

· 古城史话 ·

洛阳老城史话 李健永(103)

明藩王府邸演改 赵振华(110)

唐东都大内明堂遗址 郭正茂(120)

编 后 (121)

辛亥革命在洛阳

郭文轩

革命火种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在全国各地爆发。清政府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政权，颁发“新政”，妄图缓和矛盾。“废科举，兴学校，派留学”，就是这种“新政”的一个项目。

一九〇三年，河南省开封设立了“河南优级师范学校”，接着在洛阳成立“河南府中学”堂，由知府满人启绥兼任学监（校长），伊川人申万杰为副监理。教师有偃师人杨元懋，洛阳人刘庆渝，李天锡，伊川人邢润斋，孟津人郭芳五等，都是开封优级师范的毕业生，同盟会员。其学生中有洛阳的白西庚、金炳光、郭之莲、杨少万、刘果思想都比较进步。他们中流传着一句共同的语言：“除死无大难，到乞不再贫。”伺机进行革命。

起事失败

当辛亥年十月十四日（农历八月廿三日）武昌起义的消

息传到洛阳后，中学堂的革命师生，齐集洛南八里堂村洛阳高等小学堂教师王法岐家开会，商讨在洛阳响应起义的大计。会议决定：派石又蹇、蒋我山、邢润斋三人去嵩县策动羊山绿林豪客王天纵、张治公、柴云升、憨玉琨、马水旺等这批反政府武装；派杨元懋去开封与同盟会河南支部联系；派刘镇华去潼关与秦陇复汉军东路大都督张钫接洽，请他领兵东进夺取洛阳。其余的人分赴城乡各地与“在园”（小刀会）的组织，取得联络。约定农历十月廿五日羊山绿林军与“在园”农民军里应外合，一举光复洛阳城。

十月廿四日，羊山弟兄在石又蹇等革命同志宣传革命道理后，即由王天纵率领一千多人开到龙门，廿五日进到关林。“在园”农民与城内小手工业者，也化装进城。这时洛阳城里空气十分紧张，真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正在这时，满清地方政权从开封调来的毅军赵倜部队五个营的兵力于当天下午赶来，进城后即关闭城门在各街大肆搜捕。“在园”首领南大定被逮捕，其余“在园”的农民领袖袁同顺、郭鸿恩、刘子青等率众从东南城角撤出城外。攻城计划遭到失败后，王天纵也从龙门退入嵩县。

英勇不屈

南大定被捕后，备受严刑拷打，他毫不屈服。知县陶炯然逼讯“城内都有那些人在园”？南说：“要说多少人在园，多则四万万，少则只你我二人。”反动政府无计可施，遂于次日杀害了南大定。

这时，蒋我山、邢润斋在潼关与张钫交涉出兵攻占洛阳

的计划，张即派刘镇华先来洛阳。刘到澠池后，石又襄迎入嵩县，柴云升、张治公、慈玉琨一致愿归张钫领导。张即让刘镇华担任这部军队的统领，号称“秦陇豫复汉军”，并接收了“在园”的抗清群众，部队很快扩充到三千余人。王天纵的一支人马，从洛阳撤到老河口与鄂北革命军黎天才、蓝天蔚部会合，在湖北、豫南一带打击清军。张钫、刘镇华的复汉军与清军赵倜、周拔麟的军队相持于崤函之间，因粮弹不足，退守潼关。

风云变幻

窃国大盗袁世凯夺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登上民国大总统的宝座后，为实现复辟帝制的野心，发动了反革命战争。这时洛阳的革命党人刘果、杨少万、刘庆谕、白西庚、金炳光等，组织“二次革命”，利用各种场合宣传袁世凯背叛民国的种种罪行。同时由杨少万去灵宝，请刘镇华率队伍去洛阳宣传独立，讨伐袁世凯。哪里知道刘镇华早已接受袁的密令，正准备开赴洛阳对革命军进行镇压。杨随刘军到洛阳后，即被软禁起来，并诱捕了刘果。

刘果就义前，给他七十岁的老母写了封绝命书，其中有句云：“母也勿以儿为念，果则一死报国恩。”不久袁世凯在全国讨伐声中病死，国内政治形势出现了另一种局面。

反袁斗争两英烈

刘梦成

(一)

杨少万名瑾华，洛阳西关人，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父成万，武举人，经商起家，为洛阳有名之五大户。少万幼年好学，聪颖过人，十七岁考中秀才，后在北洋法政学校肄业，捐法部主事。当时清廷政治腐败，丧权辱国，少万热爱祖国，矢志振兴中华，极为痛恨清廷无能。在康、梁维新失败后，废科举的声浪，仍甚高涨。自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后，新式学堂在各省也陆续兴起。他对封建教育，早已失去信仰，决定到外地求学，吸取新的知识。他说服父母，指出科举即将废除，自己要到京、津求学，并顺便看看自己家中在外地的商业情况。经过双亲的允许，他于1901年离家外出求学。

少万在北京停留期间，他听到外国侵略中国的罪行，曾几次到菜市口凭吊过自己敬仰的谭嗣同等烈士断头流血的刑场。他对谭嗣同“愿身成骨，骨成灰”的革命精神更加敬佩。他还到东交民巷，西什库教堂看过义和团义士们洒过鲜血的土地。他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不久，即辗转到达广州。

他对自家在广州的商业情况漠不关心，而对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振兴中华的革命思想，以及建立共和国，实行民主立宪以救中国的崇高精神，倍加钦敬。所以，他在1902年，就正式参加了兴中会，后转为同盟会会员。

少万由广州归来后，正值中秋佳节，趁全家赏月之际，他讲述了洋人用洋枪洋炮杀害义和团以及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情况，激起了全家人爱国热忱。

赏月后，少万让四弟去睡觉，他把二弟三弟带到书房，向他们讲述南方正在闹革命推翻满清，振兴中华，由人民自理国家大事的主张。他还讲述了满清政府统治的腐败，人民生活水深火热的情形。他还说：“我们是炎黄子孙，理应为祖国出力，每人都应起个新的名子，以表我们对中华的忠心，将来做个对国家有用之才”。所以，他给四弟性存起名葆华，三弟兰卿起名灿华，二弟品卿起名衍华，少万个人起名瑾华，表现出他热爱祖国之赤忱。

少万在家时，常与同盟会会员举人白锡庚、秀才刘庆谕、杨蔚生、教员胡景殷等密有往来，共商国是；并积极发展组织，革命思想甚为活跃。1905年，洛阳成立了河南府中学堂，少万与校长杨元懋，初不相识，后来往甚密。1906年，该校有了同盟会组织。为了发展经济，联络会党，争取清兵反正，经过研究成立了“军装局”。由少万负责经营，将营业收入，作为革命经费。如洛阳东关的“在园”农民组织，嵩县王天纵的地方武装，都得到不少资助。军装局除大量为清军制做军服赚钱外，又秘密为陕西起义军赶做三千套军装，密藏在少万家中楼上，准备建立民军时需用。所以，军装局既是结交清官员的公开商业组织，又是革命志士进行秘

密活动的联络站。

1912年，民国告成，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清帝刚刚逊位，袁世凯竟篡夺了胜利果实，窃据了大总统职位。少万过去在京就听说“袁世凯的顶子（清朝红缨官帽）是人民鲜血染红的”，所以他对袁窃据大总统职位后，更为痛恨和警惕。不久，同盟会归并为国民党，委少万为北方七省招待员。并与洛阳货捐局局长沈竹白、刘培之等受孙文、黄克强委任，在郑、汴、洛招待国民党国会议员，并组织领导河南反袁斗争，“密谋河南独立”。

沈竹白来洛任货捐局长后，与少万日夜密谈。沈君学识渊博，留学日本东都大学，在天津北洋大学、中州大学堂任教多年，是老同盟会会员。他对时事分析深刻透辟，深为洛阳革命党人所敬重。

1913年春，袁世凯公开宣布解散国会，捕杀革命党人。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以武力声讨袁的罪行。袁指示凶手，在上海沙河车站刺死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先生。消息传来，举国愤慨。洛阳革命党人，齐集在少万家中召开追悼大会。大会由沈竹白主持，并亲撰挽联：“国会将成，先生遇害，未伸大志，未展大才，在九泉下安能瞑目”？！下联是：“正凶已获，主使难逃，必揭其皮，必剖其腹，视五脏中究是何心！！”。少万先生并介绍了宋教仁先生遇害经过。一致表示化悲痛为力量，电请政府，严惩元凶。还决定唤起民众，维护中山先生公布的《临时约法》。

“二次革命”南方武装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被袁指为“乱党”，全国通缉。袁派其表兄张镇芳担任河南督都，成立了所谓“河南戒严司令部”。派出大批便衣、侦探，跟踪

追迹，捕杀革命党人，洛阳是陕、晋门户，反动当局极为注意，不久杨少万也以乱党分子，宣布通缉。

少万在紧急关头，化装商人，出奔山东，不幸在周村戏院被捕。十月间对少万家进行查抄，把秘藏的三千套军装，全部抄走。并在少万的住室，抄走了一个黄色皮箱。皮箱内装有不少重要革命文件。一时洛城革命党人受株连者数十人，如白锡庚拒捕自杀，刘庆谕等遭逮捕。使洛城气氛十分紧张。

少万被捕后，由山东解往开封，即被砸上镣铐，重刑逼讯。经过一个多月的酷刑折磨，拷打得体无完肤，但始终未达到敌人目的。在此期间，张镇芳又把押在洛阳的胡景翼、杨蔚生等也押解开封，一同审讯，逼他们交出“乱党”人员名册，招认犯有推翻民国罪行。但一致回答：“为民主共和奔走，为巩固民国献身，何罪之有？要名册从未见过”。敌人计未得逞，又将少万父母押解开封，逼二位老人，让儿子说出名单藏于何处，即可释放。在未能达到目的情况下，对二位老人也施加重刑，令少万在旁观看，企图逼出一丝线索。但少万父子大义凛然，敌人以此令人发指的暴行，也终无所获。最后，敌人恼羞成怒，乃于1914年1月28日，在孝严寺将少万杀害，终年31岁。

少万就义后，社会震动极大。半月后，上海《生活》杂志刊载豫都宣布的所谓罪状：“……乱党要犯杨少万，原名瑾华，兼任七省乱党招待员。背叛党国，响应孙黄，图谋破坏……杨与洛阳货捐局长沈竹白……同谋响应孙黄，凡乱党西行者，均以彼为停居点……”。又载：“杨瑾华之父，闻监禁十年，并没收其财产……”等。

洛阳货捐局长沈竹白，也在洛被捕，押解开封监狱，与杨少万先生，同时殉难。

(二)

刘果字培文，号铨三，洛阳老城解元街人（现鼎新街）。早年素有大志，深切痛恨清政府丧权辱国，民不聊生。因而响应孙中山先生号召，参加同盟会，是洛阳革命党人中坚。他与黄克强有密切联络，经常活动于京、津、晋、陕各地，为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背叛党国，而积极奔走。“二次革命”时期，他接受黄克强指示，在洛阳及豫西各县，发展地方武装，事泄，不幸被捕，押解开封府衙监狱，与家人消息完全断绝。

刘果在狱中与问官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义正辞严的痛斥袁世凯背叛革命的罪行。据当时的狱官李清斋（洛阳人）告诉其亲属说：“烈士在狱中，常彻夜不眠，踱来踱去，心有所思，每次审讯时，他昂首挺胸，常斥责袁的祸国罪行。并说：‘革命党人，何罪之由？！’使问官无言以对。但问官恼羞成怒，表示非杀不可，而烈士则毫无惧色。”李清斋还说：“我劝烈士态度要缓和一些，免受皮肉之苦，他断然回答说：‘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使我深有敬慕之感。”

在临刑前夕，李清斋狱官以同乡之谊，敬以酒菜，并问其有无所托？烈士说：“家有七十岁老母和妻子幼女，心中当然有些牵念，我写封书信，望你交给我的母亲”。说罢咬破手指，写了一封血书。血书是：“果为国为民而死，母勿为儿死伤悲”！次日，刘果烈士在禹王台慷慨就义。

刘果殉国后，家境极为凄惨。遗女春杏，年仅六岁，其母与妻子因悲伤过度，相继去世。春杏乃由其舅父金炳光家（老城乡范街徐汉文结婚。1937年，国民政府发给烈士家属恤金四百元，洛阳党部通知其侄子领取。致使春杏为烈士刻石立碑之愿望，终未实现。

春杏有子女各一人，男名留全，女名爱荣。因春杏、汉文早逝，其子女在艰难困苦环境中，亦工亦读。最后，留全毕业于汲县医专，现任宜阳县人民医院主任医师，爱荣毕业于开封师范学院，现任河南省建六公司子弟学校教师，这是刘果烈士仅有的后裔了。

冯玉祥及其“施政碑”

李健永

一九二七年后，冯玉祥部队在洛阳的势力得到巩固后，发布了他的施政主张，现留下他题写的“施政碑”，就是历史的见证。碑文写：

我们一定要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扫除净尽，我们誓为人民建立极清廉的政府。我们为人民除水害，兴水利，修道路，种树木及做种种有益的事。我们要使人人均有受教育，读书识字的机会。我们训练军队的标准是为人民谋利益，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武力。

民国十六年 冯玉祥

此碑解放前，平铺在老城东大街马路上。解放后，经过文物部门收存，现展出在洛阳古代艺术馆里，游者看到此碑，对冯玉祥将军的革命进步思想深感敬佩，在碑文中他特别提倡“誓为人民建立极廉洁的政府”。这句话，更为人民所称道，因为它在今天更具有现实意义。

第十八集团军驻洛办事处记事

李健永

1938年10月，“十八集团军驻洛办事处”建立了，地址在老城南关贴廓巷56号左右两院，从此，它成为洛阳人民心目中的一颗明珠。

“十八集团军驻洛办事处”，最早称“通讯处”，又称“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简称“洛八办”。旧址原是南关庄家大院，是一所商行，它始建于清道光年间，建筑沿袭中国历史传统的清式的四合院，采用中轴线平面布局的格式，院分三进，前院有临街房，中间有两层的一二大厅，后院有上房，两旁均有两层结构的厢房，两院共有房约百余间，当时由一战区长官部指定，辟为“洛八办”的办公处所。

“洛八办”的建立，全国正处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期，洛阳是地处陇海线上的重镇，是豫西的政治文化中心，当时华北大片土地被日寇占领，敌寇正伺机向豫西侵犯。党中央决定在洛阳建立洛八办，先派首任处长刘向三同志，从延安出发，随带军事干部及工作人员数十人，且携带一部电台，三省军用地图等。刘向三同志持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签署的公文和延安边区人民政府主席，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写给一战区长官程潜的信，和豫西

中共特委地下党进行联络的信件通过和程潜的协商，暂允以“通讯处”名称对外办公，不久卫立煌接替了程潜，又将“通讯处”改为“办事处”。后来由于工作面的扩大，人员不断增递调遣。领导也迭次更换。处长刘向三任内是开创时期，他于1938年10月任职，到1939年5月调回延安。接着刘子久兼任处长，这时由于抗日形势的发展，“洛八办”的工作面扩大，政治生活较为活跃，工作人员由30人增加到60人左右。1940年5月后，前总又调来袁晓轩任处长，由于形势恶化，工作人员逐渐减少。

洛八办建立后，同年12月上旬，由处长刘向三负责，又在澠池县东关建立了“八路军澠池兵站”归属洛办领导。它是向黄河北的太行山、中条山和我八路军总部的要冲，是我方人员从延安、西安、洛阳，豫皖苏边区等地前往八路军总部必经的要道，我方支前物资，也是从这里运往前总。

洛八办的编制，设处长一人，秘书一至三人，总务科长一人，司务长一人，副官多人，一个警卫排，炊事班，机要股，电台室，译电员，卫生员，通讯员，饲养员，发行员，交通员等。招待所里经常住有各地来此办公的军政人员和地下党员。洛办主要工作人员除以上三位处长外，下属负责人有：秘书主任王吉仁、总务科长苗化铭，秘书吴波、刘泽如和李泮溪，电台台长陈万智，机要股长武政修，交通科长焦万宝，副官杜征远，王大勇，刘建先，司务长周士英，警卫班长苏汉华，此外负责人还有罗之光，徐立行，孙超，李铁汉等先后来此工作过的人员共一百三十余人。

“洛八办”建立后，担负着重要的使命，现将它的活动情况分述于后：

(一) 和国民党一战区长官部进行上层统战工作。当时一战区管辖河南省全部，山西省一部分，东到山东省海边和江苏安徽的北部，西至潼关，当时是国民党最大的一个战区。另外，党中央前总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八路军与新四军联系均由洛八办联络，更重要的是一旦豫西沦陷，拟在伏牛山，嵩山，桐柏山，开辟抗日根据地，进行游击战，扩大抗日武装。

洛八办的统战工作。党中央经常派重要人员和卫立煌联系，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使我军抗日工作能顺利进行，特别是党中央领导同志来到洛办，对统战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刘少奇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为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建立中原局的决定，于1939年元月来洛阳，带有毛主席写给卫立煌的亲笔信，会见了卫立煌，因为卫立煌将军曾到过延安，受到过延安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党中央首长的殷切招待，使卫将军留下了友好的印象。卫立煌又是一位主张抗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因而在这次会谈中，提出日军一旦攻占洛阳，双方如何协同作战的问题，彭德怀同志在谈判中，满怀激情的列举出我军在前线浴血杀敌的英勇事迹，痛斥国民党部队制造分裂，杀害我方抗日有功人员的可耻行为，并当场向国民党军政人员，揭露了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卑劣行径。

1940年5月间，正值日寇猖狂进攻，国民党各路军队败退时期，我党为了坚持统一战线，进行谈判，团结抗日挽回危局，制止磨擦，朱总司令不辞劳苦，越过壁立千仞的太行，渡过汹涌澎湃的黄河，来到一战区长官部所在地洛阳。他在来洛途中曾写过一首《出太行》名诗“群峰壁立太行

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峰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随行人员，康克清，吴波，周文龙等同志和警卫连护送同志，都得到卫立煌派专车到黄河铁谢渡口去迎接，下榻长官部招待所，每天四餐，盛情款待。朱总赠送卫立煌延安出版的书籍数十册作礼物，卫立煌也回赠了礼物，给康克清同志毛瑟枪一支，又为随行干部各缝制了一套斜纹布料军服，为战士们发灰色新军装一套，军鞋一双，双方在谈判中重大问题不经蒋介石批准，卫立煌无权解决。但在他职权内的事，尚给解决。重要的有，保留了八路军的中条山的运输线的畅通；并将国军无理在山西、豫北等地抓捕我方抗日人员一百余人全部释放；由洛八办负责人领回。另外通过协商，解决了国民党军需机关扣发我军军饷的重要问题。朱总在洛停留期间，卫立煌以一战区长官名义，举行盛筵欢迎朱总司令，并命洛阳驻军师长以上将领参加，接着又以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名义，召集了党政负责人及知名人士，设宴欢迎朱德。当时朱总的警卫连战士们，又和一战区长官部特务团和洛阳篮球队分别举行篮球友谊赛。洛阳五月，牡丹盛开蝶飞蜂舞、春光融融，我八路军战士活跃的士气，为古都洛阳更添了新的春色。在朱总离开洛阳的前夕，到洛八办作了政治形势报告。那时，洛阳人民和一些爱国人士，对朱总的来洛，都象从黑夜看到黎明的曙光一样，精神上受到鼓舞，增强了抗日必胜的信念。

徐海东同志到洛办时，为解决密县事件也曾写信给卫立煌，营救了我方被捕的交通员出狱。

（二）在洛办召开了党的重要会议，开展了县区基层党组人员的培训工作。

洛八办当时是公开的统战机构，曾给我豫西地下党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掩护和方便，1938 年底，刘少奇第一次来洛时，曾化名“胡服”，利用“渑池兵站”作掩护，在那里组织召开了中共豫西特委扩大会议，参加人员有特委负责人刘子久，纪西、郭晓棠、王志杰、吴祖貽、吴应先及陇海铁路书记徐世奎等人，此外还有豫西各县委负责人邵文杰、刘道安、陈耳东、贺崇陞、蔡迈轮、李之放、王文长、朱之闻、刘伯欣、韩达生、赵式平、关周光、曲树棠、雷明等三十余人。会上少奇同志又作了几点指示：一、积极组织武装力量，于豫西沦陷时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二、大力发展党的基层组织，注意在农民中发展党员。三、开展训练班培训党员干部。四、向抗日根据地大量输送干部和知识青年。最后又提出将豫西特委改为豫西省委。将各中心县委改为地委，这次会议对豫西地下党的蓬勃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渑池会议后，豫西省委利用渑池兵站开办了两期党训班，由豫西省委宣传部长郭晓棠任班主任，学员中有县、区级和基层支部书记的干部，每期三、四十人左右，三周一期，第一期全体学员参加了少奇同志为会议作的两次报告，一次是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初稿），再一次是报告了《中国共产党史》（记录稿），这两次报告记录，又由党组织传达到基层，对地下党的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1939 年 9 月间，少奇同志从延安返回竹沟途中，和徐海东同志一行又一次来到洛八办。到洛八办后，他们一同参加了卫立煌及参谋长郭寄嶠设的便宴，作陪的还有几位在洛阳的国民党将领。席间少奇同志对当前抗日形势作了正确分析后，特别强调了国共两党密切合作的必要性，批驳了一些